

再思戰爭下的繁榮城市

——評巫仁恕《劫後「天堂」： 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

●毛升



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中日戰爭（1937-1945）期間，三分之一的中國國土淪陷，大部分沿海城市為日軍佔領，涉及人口超過全國一半以上。淪陷後，城市生

活發生了甚麼變化？我們今天對淪陷後中國城市的記憶主要為「南京大屠殺」所定義：「三十萬」平民慘遭屠戮，人口銳減，經濟凋敝，通貨膨脹，糧食嚴重不足，生活用品匱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的著作《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以下簡稱《劫後「天堂」》，引用只註頁碼）卻呈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圖景：在汪精衛政權統治下的江南名城蘇州變得更加繁榮，更負「天堂」盛名。

我們對淪陷後中國城市的記憶主要為「南京大屠殺」所定義。巫仁恕的《劫後「天堂」》卻呈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圖景，透過對茶館、菜館、旅館以及鴉片煙館四種休閒行業的考察，展示蘇州的消費生活在淪陷後如何變得更加繁華。

一 內容概要

《劫後「天堂」》全書共分六章，透過對茶館、菜館、旅館以及鴉片煙館四種休閒行業（「四館」）的考察，展示蘇州的消費生活在淪陷後如何變得更加繁華。

第一章「從傳統走向現代」探討了近代蘇州的城市發展，以及

「四館」從明清到民國的現代化過程。蘇州曾是中國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最發達的城市之一，但在太平天國之亂後遭遇嚴重破壞，其重要性也逐漸為上海取代。晚清之際，蘇州的民族工業如絲織業與城市建設有了長足的進展。辛亥革命後因相對安定，蘇州成為除上海租界之外江南另一安樂之鄉。1920至1930年代蘇州城內外馬路的翻修，極大地改善了市容及交通，對商業的發展助益不少。

本章接着略述了蘇州「四館」的發展歷史。蘇州盛行吃茶之風，茶館林立。「茶會」是各行各業聚討論商情的場合，也是各種勢力調解糾紛的機制，即俗稱的「吃講茶」（頁26）。蘇州經營飲食的菜館業在明清時期就已相當發達，菜餚精美，環境優雅。進入民國後，酒樓盛況依舊，且出現了西式菜館。但從1931年底起，菜館業開始不景氣，商家紛紛歇業，盛況不再。蘇州之所以被稱為「天堂」，據說是因為蘇州人好遊。隨着旅遊業的興盛，旅館也應運而生，明清時期就出現了客棧。清季鐵路的開通帶動了蘇州的旅遊風潮，成為旅館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契機，新式旅館紛紛建立。及至1932年，旅館已多達三十五家。蘇州在晚清時期煙館林立，與茶館、酒肆三足鼎立。受西方視鴉片為毒品之觀念影響，清政府在蘇州施行禁煙措施，並取得一定成效。民國初年基本延續了清政府此一政策，惟政局不穩，執行不力；且煙捐為蘇州警察機關的主要經濟來源，如何多收煙捐才是首要考量。1916年後，軍閥割據，

政府視煙土為稅收之唯一收入，禁煙只是幌子，實際上在鼓勵甚至強迫農民改種鴉片。倒是蘇州淪陷前兩年，蔣介石頒布「禁煙通令」，厲行「二年禁毒、六年禁煙」計劃，成效顯著，吸食鴉片之風氣有所遏止（頁60）。在戰前，除了煙館，其他三館都成立了自己的同業公會，在解決勞資糾紛與政府稅捐問題時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章「從天堂到地獄」首先追溯了蘇州淪陷的過程，接着探討之後成立的維新政權與汪精衛政權的政策對「四館」的影響。從1937年8月16日起，日軍開始轟炸蘇州，至11月攻下。進城後，日軍燒殺姦淫，城市遭遇了太平天國之亂後最嚴重的浩劫。蘇州原本人口約三十六萬，至淪陷時大多已逃走，城內居民僅剩二萬。直到1939年下半年，蘇州的情況才逐漸穩定，市面開始復興，人口亦恢復至大約二十八萬。1937年底，部分蘇州地方精英在日軍操縱下成立了自治會，進而在第二年成立了江蘇省維新政府，但控制的區域僅限於城區。為了獲得稅收，省政府不僅將煙館合法化，還對其他三館徵收重稅。

1940年3月汪政權成立，穩定了淪陷區的秩序。蘇州成為江蘇省的省會後，大量人口進入，社會結構出現巨大變化。汪政府的財政收入中消費特稅一項，主要來自休閒行業，其實行的物資統制、控制貨幣與價格等政策對休閒行業影響頗大。汪政府在戰爭後期所推行的「新國民運動」，實行節約消費制度，對「四館」影響亦大。其所推

1940年3月汪政權成立，穩定了淪陷區的秩序。蘇州成為江蘇省的省會後，大量人口進入，社會結構出現巨大變化。汪政府的財政收入中消費特稅一項，主要來自休閒行業，其實行的物資統制、控制貨幣與價格等政策對休閒行業影響頗大。

行的禁煙運動，則導致多家煙館被關閉。

第三到第六章分別討論淪陷後蘇州「四館」的情況，但各有側重。第三章「嚴禁與取締下的茶館」考察茶館的經營與發展、社會功能、同業組織的成立與轉型，以及汪政府對茶館的控制。淪陷初期百業蕭條，娛樂行業卻依然興旺，1940年後茶館數量更是增長迅速。即使戰爭後期茶葉供不應求，價格飆升，茶館標價依然水漲船高，仍不乏消費者。當地報紙既讚歎蘇州生活的閒適，也感慨蘇州人只懂享受，並認為這是在戰時「極度苦悶中」的一個寄託（頁113-14）。淪陷後的茶館仍然承續了戰前的社會功能——娛樂消閒、商業交易、交換商情、調解糾紛等。但為了生存與營利，茶館開始提供新的娛樂與服務，如從上海請來樂隊與歌女、聘用女茶房與女招待，增加茶館的聲色。此間同業公會的功能也發生了變化，成為配合政府平抑物價與管控衛生的機制。同時，汪政府對茶館的控制也超過了之前的政府，涉嫌操縱物價的茶會被打壓，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自由度降低。這一切都表明在汪政府治下，政治對日常生活的干預有所加強。

第四章「『利市三倍』的菜館」指出，蘇州淪陷後，菜館業的經營雖然面臨諸多問題，但仍有所發展。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導致成本陡增，經營者必須小心面對。汪政府對同業公會的控制也在不斷加強，但懂得經營者仍獲利甚豐，比如利用黑市、規避限價令、通過同業公會在稅捐上與政府討價還價

等。菜館業本身也起了一些變化：地方菜系如徽州菜式微，上海飲食業對蘇州的影響增強，還出現了音樂咖啡座，飲食文化有中西合璧的趨勢。本章的一個特色是作者利用了地理資訊系統(QGIS)工具，從空間來看蘇州菜館的分布。藉此作者發現，因為戰爭的影響，蘇州傳統上菜館雲集的地方已經衰微，而由於交通的發展，尤其是火車站的重要性增強，菜館從原來依河道而設，改為依大馬路和火車站而設。蘇州成為省會後，官員、公務人員成為菜館的主要消費群體，而政府機構集中之地亦為菜館雲集之所。

與茶館、菜館比較，蘇州旅館業的興盛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得益於人口流動的增加，造就了新的消費群體，這是第五章「高掛『客滿牌』的旅館」講述的內容。蘇州旅館業發達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些原因跟茶館、菜館的興盛雷同，如交通恢復，社會穩定；蘇州的旅遊業在1939年逐漸恢復，官員、民眾以及日本遊客都是旅館的主要客人。另一方面，作為省會及江南重要交通樞紐的蘇州，由於公務人員及難民大量湧入，出現了房荒。即使蘇州的旅館數量超過戰前，價格貴、質量差，還總是客似雲來；有些旅館更是「煙」、「賭」、「娼」的淵藪。在經營上，旅館業亦面臨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政府限價政策和更嚴格的管制等問題，還有嚴重的勞資糾紛。業者通過同業公會不斷抗爭，仍然獲利甚豐。直到淪陷後期，汪政府實行了更嚴格的限價及停電政策後，旅館業才逐漸衰落。

蘇州淪陷後，菜館業的經營雖然面臨諸多問題，但仍有所發展。汪政府對同業公會的控制不斷加強，但懂得經營者仍獲利甚豐，如利用黑市、規避限價令、通過同業公會在稅捐上與政府討價還價等。

作者認為戰時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特殊社會心理，使得人們把「四館」當成「現實的避難所」。然而，蘇州「物資充裕」、「生活安適」的另一面則是貧富懸殊，勞資糾紛持續，女性被物化。這種繁榮並非常態，而是「畸形」的繁榮。

第六章「不戒吸的煙館」指出因為鴉片的特殊性，蘇州煙館的盛行直接導源於日本人及其扶植的政權的政策，故在「四館」中與政治的連結最緊密。淪陷後，日本人與維新政府合作，將鴉片合法化，並主導了鴉片的銷售，使其成為重要財政來源。因此，淪陷後的蘇州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現象——政府批准成立的戒煙所即為鴉片煙館，吸煙盛行。汪政權上台後，試圖禁煙，但遭日本人干預，並未切實執行。到1942年下半年，汪政府開始推行「新國民運動」，禁煙成為重要議題，1944年開始更公開執行禁煙政策。為何汪政權對禁煙的態度如此反覆？作者提出了新的解釋，認為始終為統治合法性不足所困擾的傀儡政權希圖透過禁煙運動，從道德層面提高其合法性。

本書結論部分試圖更深入地探討以下四個方面的議題。首先，「四館」繁榮的原因何在？蘇州在汪政權統治下，治安相對穩定，物價亦比上海低廉，大量逃亡的蘇州人返回家鄉，外地人亦選擇蘇州為避居之地。最顯著的特點是大量公務人員進入蘇州，他們是汪政府裏的新貴，揮霍甚豪，成為最具消費能力的群體。另外，蘇州作為江南交通孔道及旅遊勝地，都在在推動了消費業的發展。除了社會結構的變化，作者認為戰時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特殊社會心理，使得人們把「四館」當成「現實的避難所」，尋找暫時的安樂窩，做一個「粉紅色夢」（頁258）。然而，蘇州「物資充裕」、「生活安適」的另一面則是「路有凍死骨」的慘象，乞丐增多，自

殺率高，貧富懸殊。同時，暴力事件頻發，勞資糾紛持續，女性被物化。因此，作者在書中不斷強調，這種繁榮並非常態，而是「畸形」的繁榮。

其次，本書除了顛覆我們對於淪陷後城市生活一片凋敝的刻板印象外，也意圖重新評價汪政權——從市民大眾的生活來評價其在淪陷區的角色與作用。毫無疑問，作者認為汪政權維持了蘇州社會的穩定，使得繁榮成為可能，儘管是「畸形」的繁榮。作者發現，汪政權的主要勢力還是在城區，與消費有關的收入是其主要的財政基礎。從政府深入社會的程度，以及汪政權對「四館」的統制，可以看出淪陷區政府的權力在不斷擴張，社會空間受到持續擠壓。

再者，在汪政權統治下，同業公會從戰前作為政府與業者溝通的橋樑，變成了直接由國家控制的民間組織。那麼，業者如何在這一非常時期生存下去？是否有所謂「弱者的武器」？作者發現，業者並非對政府的指令照單全收，他們透過消極不配合、黑市交易、同業公會、茶會等渠道，試圖在日常經營中反抗政府的剝削和管制。

最後，作者更大的學術野心還在於將淪陷區城市的變化放入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脈絡中來考察。戰爭給了如蘇州這樣一個衰敗的城市新的發展契機，在作者看來，這種「畸形」繁榮的城市發展形態有不同於其他歷史時期的特質，作者稱之為「戰爭下的繁榮城市」（頁266-69）。

《劫後「天堂」》是中文學界關於淪陷區研究的一部力作。從觀點上

修正了我們對於淪陷區以及汪政權的簡單負面印象，作者觀點持平，沒有為翻案而劍走偏鋒。本書章節設計之精心、文字之清通可讀，都可圈可點。本文以下將該書放入學術脈絡中評點其中的得失，以及討論今後或可進一步研究的地方。

二 從忠奸分明到模糊複雜

近年來，中外學界關於淪陷區的研究出現了明顯的範式轉移。之前，基於民族主義立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與德、日等侵略者合作的人物都被斥為「通敵者」、「漢奸」，對淪陷區的經歷則以「奧斯威辛集中營」、「南京大屠殺」定義之。近年來學者開始強調所謂「協力」(collaboration)現象的複雜性與模糊性(ambiguities)，批評民族主義視角對歷史的簡單化。

比如對法國人在德國佔領時期(1940-1944)的抵抗史，學界最起碼經歷了兩次範式轉移。1945年法國重光後，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和法國共產黨都聲稱法國人在自己的領導下勇敢地抵抗納粹德國，但這種抵抗的迷思到1960年代被瓦解：法國人發現國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支持甘心為德國服務的維希政權(Vichy France)；更多的人不是在抵抗，而是基於利益算計，冷眼旁觀究竟哪方可以獲勝，以便倒向勝利的一方；更有甚者成了維希政權的幫兇，將數以萬計猶太人送上了不歸路。近幾年來學界出現了新的範式，又重新強調

「法國人是抵抗的」。新的研究不去談零星而微弱的有組織的抵抗，而是把焦點集中在法國人的「不合作姿態」(gestures of non-consent)上，比如閱讀被禁書刊、偷聽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匿藏被追捕的飛行員、掩護抵抗者、拯救猶太人等行為。透過強調這些方面，他們認為法國人的抵抗不僅是一個大眾行為，甚至蔚為一種社會運動。戰後法國歷屆政府都試圖形塑法國人對於那段歷史的記憶，這種範式轉移反映了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不同社會群體對於歷史解釋權的爭奪^①。

這種學術潮流體現在中國史方面，則是強調中國人在選擇抵抗還是合作時的模糊態度以及傀儡政權內部的複雜性。「漢奸」之所以選擇與日本人合作，並非賣國求榮，而是權宜之計，甚至是一種為了國家利益的自我犧牲。「孤島」時期在上海生活的外國人亦不例外，他們也基於如何更好地謀生，選擇是否與日本人合作。商人選擇留下來還是把企業搬到國統區，也未必基於愛國心，而是盡最大可能地保護自己的財產。某些在淪陷區與國統區之間倒賣物資的所謂「路路通」的商人行徑，在有的歷史學家看來也不必從民族大義來苛責，因為這種交易倒是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兩個區域的人都獲益。淪陷區與國統區之間的界線也不再涇渭分明，而是有着持續的互動，不僅在商業領域，也在文化交流上。學界對汪政權的評價也逐漸變得中立，戰後一直襲用的「汪偽政權」逐漸去掉「偽」字，開始承認汪政權在維持淪陷區秩序

基於民族主義立場，二戰時與德、日等侵略者合作的人物都被斥為「通敵者」、「漢奸」，對淪陷區的經歷則以「奧斯威辛集中營」、「南京大屠殺」定義之。近年來學者開始強調所謂「協力」(collaboration)現象的複雜性與模糊性。

《劫後「天堂」》把討論放到日常生活、物質文化與地域差異的層面，解構整體性民族主義忠奸論述。作者將蘇州在戰時的歷史放入明清以來中國城市史的大脈絡中考察，進而提出了一個研究近代城市史的新主題，即「戰爭下的繁榮城市」。

方面的貢獻。而對蔣介石政權的「除奸」行動，也從民族大義的角度高度評價轉變為強調其對淪陷區或租界的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太平洋戰爭後，日本人不再透過傀儡政權而是對上海實行直接統治，當地人沒有反抗，坦然接受了日本政權^②。最新的研究亦指出，上至達官顯要，下至升斗小民，都有很多人希望中日之間講和，只是大部分人不敢公開提倡罷了。和談在中日戰爭中一直沒有停止過，和談的歷史亦是中日戰爭的重要一環^③。有學者對於「漢奸」問題的思考更為深入，注意到「忠奸之辨」並非絕對，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有其複雜的社會背景，而忠奸的界線總是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移動^④。

《劫後「天堂」》無疑應該歸入這種強調複雜性與模糊性的學術範式中，而有其獨到的貢獻，即把討論放到日常生活、物質文化與地域差異的層面，解構整體性民族主義忠奸論述。作為明清史專家，巫仁恕有能力將蘇州在戰時的歷史放入明清以來中國城市史的大脈絡中考察，作更貫通的思考。太平天國之亂後，以傳統手工業為動力的「蘇杭型城市」逐漸退出近代歷史舞台，隨着蘇州衰落，以現代化企業聚集為發展動力的上海隨之崛起。但戰爭對蘇州而言倒是禍兮福之所倚，讓蘇州重新繁榮起來。

巫仁恕進而提出了一個研究近代城市史的新主題，即「戰爭下的繁榮城市」，以探究戰爭影響下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形態。這一論題似可給如今已顯疲態的城市史和中日

戰爭史研究以新的動力，但仍有待透過與其他個案比較來加以豐富與深化。比如，1927年國民黨定都南京後，城市建設一日千里，大量行政人員遷入，每月人口增加數千人。1927年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六萬，到1931年已經增至五十六萬，1935年達百萬。南京城於是瞬間繁榮起來，住房不敷居住，休閒行業亦大為興盛，大量難民湧入，社會貧富懸殊^⑤。南京這種繁榮模式如何區別於戰爭下城市的繁榮？眾所周知，香港的發展得益於二十世紀幾次戰亂時大量難民移入所帶來的資金和勞動力。與香港這一個案相比，中日戰爭下的繁榮城市獨特之處何在？

淪陷區城市史研究一向集中在上海，本書轉而研究蘇州。上海在淪陷時期的歷史非常特殊，這可能是吸引學者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書也說明對上海的研究並不足以幫助我們窺一斑而知淪陷城市的全豹。作為江南的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蘇州在歷史上曾扮演重要的經濟、文化角色，其淪陷後的遭遇無疑可以豐富我們對戰時城市歷史的了解。當大部分研究以從上到下的視角來看日本政府或汪政府如何統治淪陷區時，《劫後「天堂」》以社會面向來反觀汪政府的作為，畢竟政府與民眾的利益並非總是一致。本書不僅具體而微地呈現了蘇州淪陷後社會結構、社會心理、消費行為發生的變化，還透過探究休閒行業與汪政權之間的互動，幫助我們了解汪政權如何統治城市、其控制力有多大，以及民眾的反抗。

三 戰爭下的大眾消費史

在筆者看來，《劫後「天堂」》最大的亮點還是對二戰時期的消費史研究做出了貢獻。事實上，發現中日戰爭致使中國城市繁華，巫仁恕並非第一人。以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為首的研究戰時上海的學者已經指出，戰爭使上海租界的消費業變得前所未有地發達，並試圖對此現象作出解釋。但用一本專著的篇幅來探討該議題，本書似為第一本。

基於民族主義立場，戰後歷屆中國政府對淪陷城市的繁華諱莫如深，對研究者而言，其學術原因則源於消費史研究內在的困局。消費史研究的興起得益於冷戰時期美國大眾消費社會 (mass consumption society) 的出現，以消費促生產的消費主義模式比強調積累優先於消費的社會主義模式更具吸引力。在消費方式上，自由世界戰勝了共產世界。因此之故，首先，消費史的研究視角是美國中心的，其中的重要預設即只有政治民主的社會才可能有消費的增長，法西斯統治下的社會則絕無這種可能。其次，法西斯社會的繁華只維持了短暫數年，之後在盟軍的攻擊下變得滿目瘡痍，瞬間的繁華因而被人們忽略了。然而事實上，消費不只局限於民主環境，專制社會也有消費。

近年來，對戰時消費史的研究開始強調，二戰不僅沒有阻礙消費，反而在很多方面成為現代大眾消費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機^⑥。二戰在擁有消費社會的現代國家間展

開，維持甚至提高戰時的消費水平、滿足國民的消費需求是戰時首要的考量。得益於戰爭，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消費增長迅速，國民的需求得到巨大的滿足。有學者認為，除了意識形態外，物質上的滿足也是德國民眾願意支持希特勒 (Adolf Hitler)、甘心成為納粹幫兇的重要原因^⑦。研究發現，大眾消費社會的模式以及休閒的商業化 (commercialized leisure) 在日本的擴張也是在戰時得以實現的^⑧。在整個1930年代，日本對華侵略不斷升級，開支增大，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卻相當優裕^⑨。同時，從一戰時德國因為物資供應不足導致失敗的教訓中，日本認識到消費對於維持軍隊以及後方士氣的重要性，始終把物質消費作為頭等大事。因此，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佔領地區，日本從未施行過德國那種透過剝奪糧食來消滅佔領區民眾的抵抗力量的手段^⑩。

如果說西方學界主要聚焦於研究「總體戰」下德、日等侵略國的大後方，《劫後「天堂」》一書對被侵略國的淪陷區的消費史研究無疑可以豐富二戰消費史這一議題。儘管中日戰爭短暫地阻礙了蘇州休閒消費的發展，不過一旦蘇州不再是戰區，消費則迅猛回復和發展，消費方式更融入現代元素，如上海的影響、中西合璧的菜館、音樂咖啡館、女招待的出現等。但日本人與汪政權的戰時消費觀又不同於戰後美國社會一味鼓勵消費，而是陷入一系列的張力當中。一方面，保證消費是維持士氣以及統治合法性的

《劫後「天堂」》中對被侵略國的淪陷區的消費史研究無疑可以豐富二戰消費史這一議題。儘管中日戰爭短暫地阻礙了蘇州休閒消費的發展，不過一旦蘇州不再是戰區，消費則迅猛回復和發展，消費方式更融入現代元素。

《劫後「天堂」》對戰時消費政策在蘇州的實行作出了細緻的考察，揭示汪政權在管理蘇州消費業上的政策以及遭遇的難題都與其無法自洽的消費觀相關。這些都是之前的中日戰爭史研究者較少研究的問題。

手段。透過維持和平與富足，並與重慶政府統治下的顛沛和貧窮相對比，日本人試圖證明不要頑抗、與日本合作才是正途。另一方面，「大東亞共榮」的目標又使得日本人和汪政權不能允許治下的民眾耽於享樂而忘記他們所承擔的如「和平建國」這樣更高的理想。日本聲稱要「超克近代」(overcome modernity)、排除英美文化的影響，而消費主義在日本人眼中就是「墮落無恥」的西方生活方式，不應鼓勵，應予消滅。

戰時最重要的是軍事，如何汲取資源為戰爭服務成為首要考量，這尤其表現在處理鴉片的問題上。一方面，日本政府宣稱中國人吸食鴉片，毫無自控能力，中國無資格成為文明國，應該由不吸食鴉片的日本人來領導。另一方面，為了獲得養戰需要的大量資源，日本在中國銷售鴉片煙、收取高額稅收，滿洲國幾乎淪為一個鴉片國^①。戰爭的需要使得節約物資以貢獻戰爭成為政府的基本政策，尤其當物資緊張時，要求百姓勒緊褲腰帶過苦日子，也是無可奈何的變計。《劫後「天堂」》對戰時消費政策在蘇州的實行作出了細緻的考察，揭示汪政權在管理蘇州消費業上的政策以及遭遇的難題都與其無法自洽的消費觀相關。這些都是之前的中日戰爭史研究者較少研究的問題。

學界研究二戰消費史，除為重建史實外，還試圖重新評價德、日等國的戰時歷史在該國現代史中的角色。二戰在該國的歷史上應被看成是一個斷裂還是延續？通過對消

費史的研究，今天學界認為二戰時期德、日等國消費的發展是這些國家形塑大眾消費社會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非阻礙了消費社會的發展。戰時的消費經驗既承接了戰前消費社會的興起，也連結了戰後消費社會的蓬勃，是承上啟下的一個重要階段。而戰時這些國家對消費的積極干預，亦是戰後福利社會興起的濫觴^②。因此，戰時的歷史並非一團漆黑，也有其積極的面向。

戰後的中國不是開始重建消費社會，而是迅速陷入了國共戰爭之中。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消費方式也進入了另一個軌道。但《劫後「天堂」》似乎也在強調這種連續性，即把1980年代末中國市場化改革後出現的消費社會與戰時淪陷區的繁榮，甚至晚明的「奢華」加以勾連，認為其中有一脈相承之處。這是否有說服力，見仁見智。但本書為1949年很多人，尤其是曾生活在淪陷區的人，包括一些大商人，為何選擇留在大陸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解釋：他們「多認為在日寇佔領時，尚且可以照舊生活；中共究係同胞，當不難周旋共處」^③。淪陷史對理解1949年後的中國史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註釋

① Philip Nord, "Review of David Drake, *Paris at War: 1939-1944*; Robert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A New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Olivier Wieviorka, *The French Resista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 no. 2 (2017): 474-78; Olivier Wieviorka, *Divided Memory: French Recollections of World War II from the Liberation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Wen-hsin Yeh ed., *Wartime Shanghai*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邵銘煌：《和比戰難？：八年抗戰的暗流》（台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7）。

④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中日戰爭時期蔣汪雙簧論述〉，《新史學》，第15卷第3期（2004年9月），頁147-202。

⑤ 毛升：〈民國南京的觀瞻所繫〉（2018年1月23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2687。

⑥ Hartmut Berghoff, Jan Logemann, and Felix Römer, eds., *The Consumer on the Home Front: Second World War Civilian Consump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

⑦ S. Jonathan Wiesen, "National Socialism and Consump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nsumption*, ed. Frank Trentman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33-50; Gö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trans. Jefferson Chas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⑧ Andrew Gordon, "Consumption, Leisure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Transwar Jap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0, no. 1 (2007): 1-21.

⑨ 戈登(Andrew Gordon)著，李朝津譯：《200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280。

⑩ Sheldon Garon, "The Home Front and Food Insecurity in Wartime Japan: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Consumer on the Home Front*, 29-53.

⑪ Miriam Kingsberg, *Moral Nation: Modern Japan and Narcotics in Global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⑫ Hartmut Berghoff, "Consumption on the Home Fron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Consumer on the Home Front*, 3-25.

⑬ 姚崧齡：《陳光甫的一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頁131。